



中南海“化冰” 中办气象一新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自1954年7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的苏维民,在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即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他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直到1994年离休。他曾撰文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南海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情况。



▲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合影。左起:习仲勋、方毅、谷牧、杨得志、胡耀邦、万里、姚依林、余秋里、王任重

238名中办干部得到平反

“文革”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中办干部“文革”中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革”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

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

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都是不计得失,处处做表率。一个星期天,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文革”中,39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文革”开始后,中办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的关怀下,决定在原中办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并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

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办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中办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革”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工作。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办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后来胡耀邦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1000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上访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到会讲话再一次强调要尽快为冤假错案平反。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文革”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南海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革”中乱占房子造

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开会喝茶要自掏腰包

我回到中办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中南海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革”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三层建筑。当时二、三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胡耀邦、姚依林、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

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想到“文革”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

(据《百年潮》苏维民/文)



▲中南海勤政殿

(上接第一版)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落实起来,困难很大。一方面,有人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拒绝接受;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人认为年轻人经验少,不放心;有人顾虑离退休会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年轻干部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去,年轻干部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

设置顾问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军队时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思路,中共十二大党章修改草案加写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内

容。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员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安排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中顾委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合作与交替。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

员会共历时两届。其间,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实行,与此同时,最年轻的顾问委员也超过了70岁。于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2年中共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并从党章中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做出表率

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休或者退居二线。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后困扰全党、严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和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干部老化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党政机关人员臃肿问题得到很大改

善,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形成了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平稳快速发展。

邓小平指出:“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

邓小平身体力行,先是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与陈云、李先念实现“半退”,接着于1989年11月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

(据《文史博览》东朗/文)